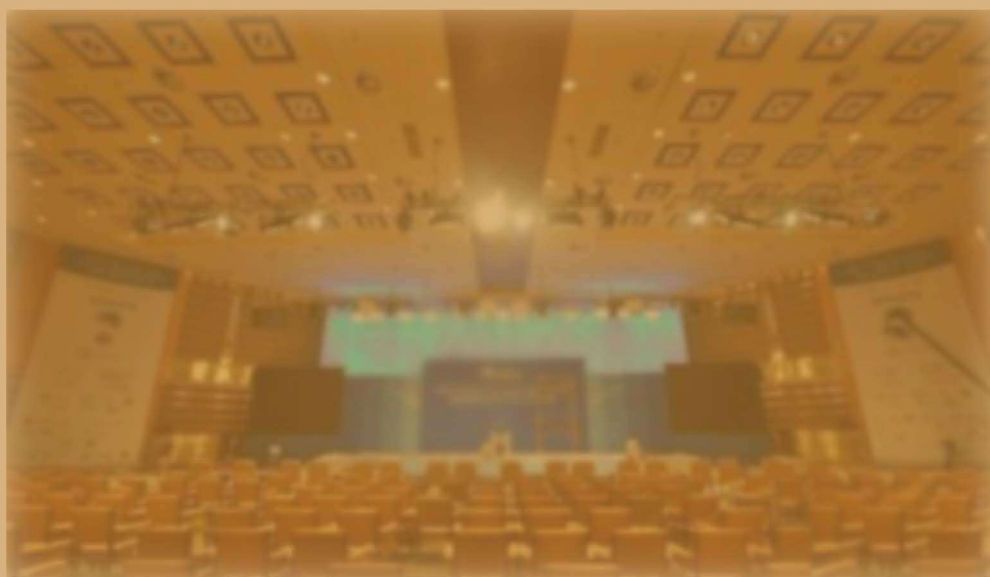


西京论坛·第4期

夏泽民 主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京论坛. 第4期/夏泽民主编.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 - 7 - 5604 - 2625 - 9

I. 西… II. 夏…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0458 号

西京论坛·第4期

夏泽民 主编

责任编辑: 侯江红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号(邮政编码: 710069)

印 刷: 陕西向阳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16

印 张: 5.5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04 - 2625 - 9

定 价: 10.00 元

电 话: (029) 85519792

电子信箱: xjlt88@yahoo. com. cn; xijingluntan@163. com

西京论坛

XIJINGFORUM

2009 年第 4 期 (总第 113 期)

目 录

主管单位:中共西安市委
西安市人民政府
主办单位:西安市社会科学院(联)
主 编:夏泽民
常务副主编:朱利民
副 主 编:蒋 涛 沙喜明
编 辑:唐穆君 白 瑾(兼职)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继 王江宏
王新民 方光华
卢 凯 卢洪涛
史晓红 吕 健
朱利民 任文斌
任军号 刘明华
李 毅 李二幸
李骊明 杨 东
杨三省 肖西平
沙喜明 张印寿
张永强 张民生
张忠堂 张学理
张建国 张普会
张瑞生 陆治原
陆晓延 苗宝明
和红星 周爱全
郑育林 赵馥洁
胡义成 钱引安
徐可为 高东新
郭大为 梁锦奎
蒋 涛 曾昭宁

编辑部主任:朱利民

理 论 思 考

一切能力都是为人民执政 ——学习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	李抒望	1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建设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化问题研究	王立洲	4
论治理理论对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影响	王旭东	7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探析	高慧娟	9

经 济 瞭 望

加快“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 的规划与建设,实现西安率先发展和科学发展	王建伟	12
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制度合作不能缺位	陈晓莉	15

社 会 视 野

关于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惠曙光	17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社会工作	杨 晖	22
从城市人的幸福感反思城市发展的取向	江 波 谢雨锋	25

西高新论坛

西安高新区城中村无形改造政策研究	刘明华 徐 伟	29
西安高新区征地拆迁模式创新研究	徐 伟 鲁良栋	32
西安高新区土地管理一元化对策研究	雷晓康	35
西安高新区万亿现代服务产业带发展对策研究	胡宏力	37
西安高新区社区建设与发展研究	李 婷	39

文 化 纵 横

西安民营文化企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唐穆君	40
--------------------	-----	----

浅谈西安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姚 蕾	42
----------------------	-----	----

陕西文化产业发展的 SWOT 分析	周 荣	45
-------------------	-----	----

法 学 研 究

论民事抗诉程序中检察权与审判权的冲突及完善	田 海	47
-----------------------	-----	----

中国湿地保护立法问题初探	马 也 杨 博 于 喆	51
--------------	-------------	----

浅论在行政执法中体现依法行政		
——实现城市管理法制化	程海鹏	55

文 学 艺 术

贾平凹的文人画情结	王志平	58
-----------	-----	----

把西安建设成东方仁都		
——对西安建设东方仁都的若干建筑—规划—景观设想	张丽敏	61

创新型互动式动漫艺术设计教育模式的探索	温 雅	66
---------------------	-----	----

行 政 管 理

城乡经济一体化新格局的发展分析	王 剑	68
-----------------	-----	----

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形成机制与条件分析	赵 佩	70
------------------------	-----	----

消费券事件引发的思考	邓 锴	72
------------	-----	----

求实创新 科研工作再上新台阶	李永兴	74
----------------	-----	----

来 稿 选 登

从民族思维的角度看英汉句法的差异	邹 华	78
------------------	-----	----

如何上好初中英语阅读课	赵美伦	81
-------------	-----	----

本刊发送：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市级各部门、西安市各区（县）、街道办（乡镇）、西安地区理论科研部门、大专院校、大中型企业、省内各地级市

交流范围：全国省、市社会科学院

一切能力都是为人民执政

——学习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

李 抒 望

(山东省临沂市委党校, 山东 临沂 276005)

摘 要:所谓党的执政能力,其本质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一切能力,都是为人民执政;一切能力,都要为人民执政。归根到底,党的执政能力要从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中来,要在与群众密切联系的实践中历练,要在严酷的反腐败斗争中提升,最终还要由人民群众来断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意义重大、任务艰巨、过程艰苦。

关键词:执政能力;党群关系;民主监督;为人民服务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必须着眼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决定》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到更高的位置,是四中全会非常突出的亮点。解读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党的执政能力究竟是什么?其实,对这个问题并不需要绕很大的弯子来讲,更不需要离题太远,去搞得很玄乎。开宗明义,说得通俗一点,党的执政能力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一切能力,都是为人民执政;一切能力,都要为人民执政。

为人民执政的能力从何而来?它不会从天而降,更不是靠少数人发明,归根到底,它要从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中来,要在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实践中历练,要在严酷的反腐败斗争中提升,最终还要由人民群众来断定。执政能力建设对执政党不仅意义重大、任务艰巨,而且过程艰苦。

一、执政为民是我们共产党人永恒的精神家园

执政,就是掌权;为什么人执政,为什么人掌权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经过长期的奋斗,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

政的党。党的这种执政地位,是通过革命斗争获得的,是用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归根到底,是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得到的。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执政的权力来自人民,所以党就必须受制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党在掌握政权的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核心,是受人民的委托,按人民的意愿执好政、掌好权,当好“三个代表”。在这里,必须十分明确,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公仆与主人、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而不是其他任何关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首先必须解决好为了人民、代表人民、造福人民这个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问题。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所做的一切,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和最终追求。因此,防止党在人民利益之外形成特殊利益和既得利益集团,是防止党变质的根本保证。一句话,万变不离其宗,所谓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根本上就是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提高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的本领。这种服务,不是上天的赐予,而是应尽的责任;尽不到这种责任,人民就会把权力收回。只有想到这里,我们才时时有一种责任感、危机感,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生怕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拥护。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擎“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主义”

大旗,鲜明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坚持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人民群众的愿望、需要、利益以及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中心地位,深切关注人民群众的生存、发展状况和人的价值,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国家建设发展的最高目标,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的最核心的执政理念,它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诠释得更加清晰、更加真实、更加务实,更具时代价值。只有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才始终是先进的执政党、充满活力的执政党;只有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府,才始终是人民的政府、受人民拥护的政府;只有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和政府,才不会变质、不会被人民所打倒和抛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执政,全心全意做人民公仆,是我们党的全部追求,是我们党永恒的精神家园,是我们党执政的伦理底线。如果缺乏对“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深刻认识,执政能力建设必然是盲目的、不清醒的,甚至有可能迷失方向,走向反面,不是“立党为公”而是“立党为私”,不是“执政为民”而是“执政为己”。执政是手段不是目的,一切能力也仅仅是手段而已,只有为民才是唯一的目的。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决不能仅仅为执政而执政,为能力而能力,首要的是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这是前提。舍此,一切便无从谈起。

二、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最强大的执政能力

1937年3月,在前苏联一次党的中央全会上,当谈到执政党与人民的关系时,斯大林曾经用希腊神话中的安泰来形容“布尔什维克也同安泰一样,其所以强大,就是因为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即同那生育、抚养和教导他们成人的群众保持联系。只要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同人民保持联系,他们就有一切把握,始终是不可战胜的。”邓小平讲,“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也就是说的这个意思。这种关系,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党要想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血肉相连,生死相依。我们常说实践是个大课堂,而人民群众则是这个大课堂上最高明的老师。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新点子,

都在实践中,都在群众中。党只有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过程中,善于汲取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执政能力才能得到历练,执政水平才能不断提高,经得住各种风浪的冲击。

当今世界,包括前苏共在内的世界上一批大党老党丧权亡党的教训都说明,如果一个党背离了绝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在长期执政的情况下,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党就变成了一个自身封闭的系统,成为凌驾于社会和人民群众之上的体系。这样,党内不仅极易滋生各种消极腐败现象,而且由于这种机制本身缺乏“自下而上”的监督,缺乏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的能力,日积月累,就形成了一套完整而僵化的体制,失去了解决自身和社会问题的能力,失去执政的坚实基础和丰厚资源,一到历史的拐点上,人民群众中的大多数便不投它们的赞成票,最终为人民所抛弃。“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我们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党来自人民、代表人民这个定位;强调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强调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就是党的最强大的执政能力、第一执政能力。

三、让人民当家做主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根本要求

执政是有规律可循的,执政党一定要遵循执政的规律。让人民当家做主,这是共产党执政的一般规律,是我们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根本要求。一个只有尊重民主权利的政党,才能赢得人民的支持;一种只有众望所归的民主制度,才能拥有前行的力量。在执政60年后的今天,我们党怎么实现民主执政,怎样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怎样通过民主关,日程越来越紧迫。这道门槛想绕也是绕不过去的,必须过。这是当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课题。但是我们怎么来推进民主,这又是一个很新的话题。对此,我们党有一个创新,叫“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如果党自身没有民主,那社会民主就根本无从谈起。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方向性的思路。

坚持民主执政,推进党内民主,《决定》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必须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必须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选举制度;必须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必须维护党

的集中统一。同时,必须健全和完善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有效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败。近年来,党和国家公共权力滥用之普遍,危害结果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逐渐使全党清醒地认识到,一切缺乏约束的公共权力必定导致腐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强化对党所掌握的公共权力的监督;监督,是民主执政的关键。监督的逻辑起点在于,任何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必须从坏处着眼,正如英国哲学家休谟的“无赖原则”所阐释的那样,我们在设计政治制度时,必须把一切官吏假定成“无赖”。休谟虽然和我们一样都知道,官吏不可能都是“无赖”,但是,必须假定他们一进入政治生活领域,就有可能成为“无赖”。把一切官吏假定成“无赖”,这没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设计出一种制度,来保证让“无赖”去为公众利益服务,并且服务好。这种连“无赖”都能去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制度,肯定是一种人类理想的政治制度。这种人类社会理想的政治制度就是民主制度,就是监督机制。所以说,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不能从“好人主义”出发,而要从“无赖原则”出发。由此而来,监督便成为民主政治之必然。这就像机场的安检制度安排一样,虽然机场方面知道,并不是所有乘客都藏有武器、都是劫机犯,但是,必须把全体乘客都假定成劫机犯,全体乘客都必须毫无例外地通过安全检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飞行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说,监督,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保护伞,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底线和生命线。我们传统政治体制设计理念的出发点,是首先假定,官员们都是人民的公仆,都是大公无私的好人,并把职务和觉悟画等号,以为职务越高越正确,官越大越高尚,直至神明。所以,我们的监督机制从本质上讲,是自上而下的,上级监督下级,干部监督群众。群众什么权力都没有,各级都来监督;而那些权力大的,相反却少有监督,特别是地方、部门的一把手,长期处在监督的真空和断层。因此,必须变革我们传统政治体制的设计起点,改变对“官员无私”的假定,实行高激励、严约束。如果我们把干部都当好人,要监督机制还有何用?改变了对官员的假定,接下来监督机制就得跟着变。要变上级监督下级为下级监督上级,变领导监督群众为群众监督领导,变少数人监督多数人为多数人监督少数人。这样一来,老百姓有了监督权,说话有人听了,才能使我们的干部真正代表人民行使权力。这才是民主执政的真谛。

四、不廉政不反腐败就谈不上执政能力建设

在人类政权的更迭史上,执政者因腐败而垮台,是一个普遍现象。当今世界,一些执政几十年的大党老党,之所以在貌似鼎盛之时丧失执政地位,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缺乏对自身腐败的惩治和预防能力。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任何外力都打不倒共产党,但如果党内腐败不除,就会不打自倒。正如《决定》所指出的“坚决反对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更有效地预防腐败,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新成效。”

党在本质上是纯洁的;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不少党员特别是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离先进性的标准还有很大的差距,确实存在着一些损坏党的声誉、败坏党的形象、影响党的工作、背离党的先进性的现象和问题。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一些党组织贯彻民主集中制不力,有的对中央决策部署执行不认真,有的对党员民主权利保障落实到位,一些党员干部法治意识、纪律观念淡薄;一些领导班子整体作用发挥不够,推动科学发展、处理复杂问题能力不够,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软弱涣散,有的领域党组织覆盖面不广,部分党员党员意识淡化、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有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讲原则、不负责任,言行不一、弄虚作假,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当前,党内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对现代化建设危害最大,对党群关系危害最大,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危害最大,也最容易丧失民心。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不廉政,就谈不上执政能力;不反腐败,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是一句空话。要想(下转第6页)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建设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化问题研究

王立洲

(长安大学人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 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很强的思想性、理论性, 要得到人民群众普遍的认同和接受, 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大众文化建设紧密结合, 以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大众文化健康发展, 通过发挥大众文化的积极作用, 实现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化。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大众化; 大众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优秀中华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重要体现, 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民族凝聚力, 而这种凝聚力主要来自人们对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发挥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巨大作用, 要深刻影响每个社会成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也首先必须被群众普遍接受, 并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为此,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能只停留在象牙塔之中, 而应该不断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化。要实现这一目标, 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大众文化建设紧密结合。在文化建设中, 除了通过主导文化和精英文化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 还要在各类大众出版物及各种文艺作品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 使核心价值体系通过形式多样的大众文化得以有效传播和真正落实。

一、大众文化及其功能

大众文化是反映工业化技术和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日常生活, 在社会大众中广泛传播, 适应大众文化品位, 为大众所接受和参与的意义的生产和流通的精神创造性活动及其成果^{[1] 34}。大众文化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类型, 在现代文化系统中与主导文化、精英文化、民间通俗文化等相对

应、相区别。它具有社会大众性、日常生活性、复杂多样性、商业营利性、巨大数量性、娱乐消遣性、强烈渗透性和意识形态性。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 内含着当代中国文化的的基本精神, 反映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时间、经验、感受, 具有社会主义性、人民性、民族性、规范性和兼容性, 其力量已经深深融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格局, 预示了一种新的文化发展理念。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 在功能上具有两面性。对我国的社会发展和大众的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既有积极作用, 也有消极影响。大众文化的积极作用表现在: 它提供了人们娱乐消遣的广阔空间, 在体制外开辟了大众教育的有效渠道, 造就了我国经济领域的新兴产业, 开创了国家政府管理社会的崭新途径, 产生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在文化全球化中, 西方大众文化的渗透和诱导以及它自身的商业性、娱乐性、消费性等因素, 我国大众文化也对我国社会生活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比如西方大众文化所隐含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对我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和价值观念产生强烈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消解着我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和文化传统, 冲击和威胁着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 在内容和

话语上嘲讽着意识形态,在市场上不断挤压主导文化的地盘;在基本的文化精神上消解着社会大众的精英文化情结,拆解着精英文化的社会基础。一些不健康的文化内容腐蚀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危害着社会主义事业。而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和社会安定和谐的重要标志。因此,政府主管部门首先必须引导我国大众文化的合理发展、独立发展,构建维护我国文化主权的有效屏障。

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导作用,使大众文化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对文化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具有制约和规范作用,因此,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贯彻到大众文化建设中,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消除大众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引导大众文化健康发展。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基础。它的主导性使大众文化的建设与发展能够在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下保持正确的方向,合理规范地发展,使中国的大众文化在根本性质上与西方大众文化区别开来,在深层次上内含着社会主义性、人民性、民族性等。

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发展提供了健全的文化方针政策,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规范着制度文化,有利于制定健全的文化市场法律法规,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引导和规范大众文化健康发展。政府主管部门对大众文化不是进行直接的、具体的政治干预,而是把核心价值体系所体现的意识形态自觉渗透到大众文化的指导思想、创作过程、市场流通过程当中,通过间接的制度、法规、政策来达到引导和管理的目的。

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批判性与传承性为文化的建设与发展确立了重要原则,它的整合性与创新性为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有效路径。使大众文化既能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获得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和国外大众文化资源,又能够形成一系列抵制腐朽思想文化侵蚀的方法途径,从而使大众文化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出发,反映大众日常生活,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合理借鉴国外大众文化,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整合创新的大众文化。

三、发挥大众文化的积极作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前建设的核心内容。要积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大众文化的引导作用,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鉴别能力和文化选择能力,自觉抵制腐朽文化垃圾的侵蚀,达到健康向上的精神境界,首先必须使人民群众普遍接受、深刻理解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就要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进一步的提炼和更为简明扼要的概括,使人们容易理解、记忆和接受。同时必须重视发挥大众文化在影响人们思想观念、价值认同等方面潜移默化的作用,积极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坚持先进性与广泛性、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提高文化产品品位与提高群众文化鉴赏水平的统一,既要大力支持精品文化,也要鼓励和发展能够使人民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享受的大众文化,让人民群众在娱乐和享受中受到教育和启发,在潜移默化中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认同。

首先,大众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有效的教育途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关键在于加强教育。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贯穿现代化建设各方面^{[2] P22}。”大众文化在当前我国社会大众的文化启蒙、文化素质的提高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他拓宽了教育途径,扩大了教育内容,降低了教育成本,深化了教育的影响力,成为我国文化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目前我国开展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主要通过各类学校和各级宣传部门开展工作,而且主要是一种思想灌输,容易和人们的兴趣爱好发生冲突,甚至使一些人产生了抵触情绪,降低了教育效果,其社会影响力十分有限。而大众文化是一种体制外的教育途径,对象面十分广泛。更为重要的是它具有通俗性和趣味性的特点,因而对社会大众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社会大众在参与和接受大众文化时,对其所内含的文化精神、道德伦理、价值观念等也就不自觉、无意识地接受了。

其次,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开拓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展传播的文化载体和现实途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主导文化的核心,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相对不高以及主导文化自身的原因,人民群众直接主动接受主导文化的程

度有限。因此,要把核心价值体系这种精神信仰层面的东西变成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利用大众文化这一人们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文化样式来进行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尤其要重视发挥文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作用,通过影视文化、民间文化、相声小品、音乐歌曲等形式多样的大众文化,通过优秀文艺作品所体现的理想观、价值观、荣辱观,在潜移默化中传播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内容,引导并影响民众的理想追求和价值取向。文艺作品要讴歌那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伟大实践和典型人物,弘扬社会正气,使人们形成积极健康的审美情趣,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其中最迫切需要重视的是如何解决以正压邪问题、社会公正公平问题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问题。

最后,要发挥大众文化对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促进作用,还必须积极培养文化大众。文化大众是指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具有基本的文化接受和参与的主客观条件,并以不同的方式和途径,在不同的

层面和程度上介入文化活动的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整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说到底也是一个培养公民的现代人格、培育与时代节拍相符合的新人文精神的过程。在人的心灵与精神园地上培养出一套核心价值体系,需要积极但不能急于求成的心态和扎实有效的措施。人类的存在需要精神的创造,更需要文化艺术对精神园圃的滋养。只要文化工作者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做好润物细无声的工作,能在坚持以情感人、以美塑人的基础上,培育人们的理想情操和价值观,鼓舞他们对生活和社会的希望。相信我国广大人民群众一定会成为具有较高思想文化素质的文化大众,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下,中国的大众文化也会快速健康地发展。

参考文献:

- [1]金民卿.大众文化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 [2]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上接第3页)扎扎实实地提高执政能力,首先要扎扎实实地遏制腐败。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可看作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除腐、自我净化的一种努力。

五、党的执政能力最终要由人民群众来断定

谁来认可和判定党的执政能力?人民群众,也只有人民群众最有资格。衡量和检验执政能力的唯一标准,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不是某种权威的理论。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党的执政能力到底如何,不是党自己说了算,即使是党的一部分人对于党的另一部分人的执政能力,也没有最终的发言权。能否取得最广大人民群众认同,也就是邓小平讲的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衡量我们党一切决策和实践正确与否,体现党的执政能力高低强弱的最高标准。除此之外,其他的任何标准都是枉谈。

政治学里常用“合法性”一词,来表述广大民众对一个党的执政能力的认同问题。其实,所谓“合法性”,就是公众对执政党的支持和拥护。《决定》指出“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

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执政的合法性,不仅体现为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而且体现为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道义上的合法性。由于各种原因,在很长时间里,由人民群众来对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效果进行评判的体制和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并完善起来,较多的是执政者的自我评估。这种自我评估是必要的,但在缺乏其他渠道的情况下,它容易使执政能力的评价带有主观性、随意性,而较少客观性、公正性。要增强党执政的权威,推动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不断提高,就必须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由人民群众来给党执政的政绩“打分”的问题。最终,要把对党的执政能力的评价权交还给人民。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只有人人起来负责,只有让人民来监督,党和政府才不敢松懈,才不会人亡政息。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9-9-28
- [2]斯大林文选: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148

论治理理论对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影响

王旭东

(陕西太白县公安局,陕西 宝鸡 721600)

摘要:20世纪末,治理理论被广泛用于政治发展和行政改革的研究与实践领域,本文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论证了“构建政府主导—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相协调”的多中心社会公共事务治理模式,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着力于建立“强政府—大社会”结构,在具体的改革中促进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良性互动,构建“管理—服务型政府”。

关键词:治理理论;行政体制;改革

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的概念,使“治理”一词在国际学术界和各种国际组织及政治领域流传开来并被广泛使用。治理理论的代表人物罗茨(R. Rhodes)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以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1]。因此,治理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

一、治理理论对当代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影响

治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虽然仅有十几年,还没有形成一种系统而完善的理论体系,但其所包含的深刻内涵及其广泛的适用性已对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一) 治理理论对行政体制改革的积极作用

促进政府治理理念的重构,实现善治:信息社会加剧了市场竞争和政府间的效能竞争,对政府治理的理念提出了挑战。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并实现善治是实现这一目的的路径依赖。主要表现为政府治理的理念发生了新的变化,强调的是制度创新、组织创新、战略创新等;政府治理内容更新,由过去以实物形态为中心的静态管理转变为以信息、知识、人才为中心的动态管理,由过去行政部门和上下级之间的直接管理转变为纵横交错的网络化、信息化的矩阵

式管理,整个社会组织强调以政府治理为中心的“离散型管理”;政府组织由传统的直线职能式结构,向小型化、灵活化、矩阵网络化组织结构发展。

坚持市场导向,重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然政府力量可以弥补市场的缺陷,纠正市场的失灵,那么市场力量也可以弥补政府的不足,防止政府的失败。实践中,用市场机制改造政府或用企业家精神重塑政府,对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商采用市场的方法或非市场的方法,并在公共组织中确立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益的激励机制。政府应该是以市场为前提的功能补偿性行政或助动式行政,是对市场功能缺陷的替补,市场调节和社会自治的剩余物。

大力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重塑新型国家和社会关系:治理理论要求打破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二元对立,把对社会的有效管理看成是两者的合作过程,要求共同承担责任。公共治理模式的过程就是寻求新型国家—社会关系的过程,重新定位政府统治与公民作用关系的过程。在治理理论看来,治理的成功实施离不开一个繁荣、活跃的公民社会,离不开政府能够释放出公民组织的自主管理能量,因为公民组织发展和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是治理得以运转的物质基础。所以,治理理论要求政府放松对社会的过度管制,逐步授权给社区、公民,大力发展公民自治组织,不断增强公民的参与意识,让他们承担一些政府做不到、不宜做的事。

(二) 治理理论对行政体制改革的消极作用

治理理论主张限制政府的职能作用的倾向不适应我国国情:变革全能型政府治理模式,政府向社会放权,需要有相应的权力承接体。这些权力承接体是在公民社会不断发育、社会自治能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形成的包括行业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和民间组织等在内的社会组织。我国目前的这些社会组织无论在其发展规模还是在其功能上都十分有限,没有形成完整的组织体系。其二,社会全面转型时期,各种问题纷至沓来,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弱化,政府过于仓促和无序的简政放权,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的改革目标,而且极易导致社会生活的紊乱,或给某些非法势力以可乘之机。

治理理论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契约合作观念与我国传统文化相冲突:20世纪下半叶以来,我国集体主义取代家庭主义传统,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倡导要把集体放在首位,以集体为重。这意味着对于处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来说,不可以也不可能照抄照搬治理理论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

治理理论有极强的意识形态倾向,有弱化国家主权的可能性:治理概念的产生及其运用也使人隐约觉得它的反政治倾向,这并不是因为它力图用“治理”取代“统治”的传统话语地位,而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治理概念首先由世界银行提出,而不遗余力倡导治理的也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这些鼓吹经济全球化、代表跨国公司利益的经济组织。这其实反映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跨国公司权力与日俱增,在“小政府一大社会”的改革旗号下,跨国公司不仅掌握了大量的经济资源,而且逐渐控制了政治话语的主动权。“没有什么比公司扩张的过程更能削弱公共领域的基础,抽取政治话语的精华了^[2]。”而且,“一个完全非政治化的公共领域有助于公司的统治,在这种公共领域中,华丽的奇观和声色犬马取代了严肃的政治讨论,取代了真正的民众参与^[2]。”

二、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府治理模式

治理理论所构建的模式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政治和社会事务的治理模式,也是在政府治理革新中人们所追求的目标,但一种成功的政府治理模式“不是超越时空的政治遐想,往往依据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而产生,在一定社会历史演变和现实运动水乳交融中逐步生长起来^[3]。”

我国未来的政府治理模式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合作,管理主体的多样性和政府对公民的服务,引入市场机制,建立“政府主导—政府、公民社会、市

场三者协调治理”的政府治理模式。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是现代社会政治秩序,然后才是多元、健康的公民社会和市场。虽然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时序联系,但是,现代民主法治是公民社会和市场健康发展以及与政府形成有效互动的必要的制度保障,也是防止它们被强势集团控制的制度约束^[4]。多中心治理模式是以成熟的市场机制为平台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也离不开政府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的体制变迁,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型的同时并进,市场本身不可能自行高效地同时完成这些任务,必然要有一种超市场力量的介入,这个力量只能是政府。多中心治理模式是以发达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我国公民社会尚处于萌生发育阶段,需要政府来培植并促使其发展。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更离不开公民。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及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5]。由于体制运行的惯性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实践中总是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从而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邓小平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在政治体制改革进退维谷而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行政体制的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启动的目的在于及时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并进而带动政治体制的改革。

三、结语

任何一种政府治理模式都是由人构建的,属于“思想的社会关系”范畴,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实施构建行为。构建政府治理模式时往往受到历史传统、现实任务、理论基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政治时局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政府主导—政府、公民社会、市场三者协调治理”的多中心社会公共事务治理模式,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应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步伐,进行不懈的努力。

参考书目:

- [1]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2]卡尔·博格斯.政治的终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3]林尚立.国内政府间关系.总序[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 [4]杨雪冬.要注意治理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问题[J].中国行政管理,2001(01).
- [5]俞可平.民主与陀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探析

高 慧 娟

(陕西师范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的一次创举,它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也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弄清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有重要的意义,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指明方向。

关键词: 毛泽东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关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的一次创举,也是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个重大贡献。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毛泽东思想没有被包括到这一体系中,尤其是这种概括似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始于毛,成于邓”的传统说法相矛盾。这一问题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本文着重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分别属于不同的历史范畴、毛泽东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而非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并不是对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否定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分别属于不同的历史范畴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尽管二者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但它们形成的时代背景及其主题、需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及理论的主体内容都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二者形成的时代背景及其主题不同。毛

泽东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调查研究中国国情、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20世纪30年代同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前中期基本形成,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就时代主题而言,主要是战争与革命。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和平与发展是这一时期的时代主题。

其次,二者需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不同。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为如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指明了方向,成功地实现了第一个历史任务,即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以及如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成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的报告中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

华民族面对的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实现了第一个历史任务,并且为第二个历史任务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现实条件。

最后,二者的主体内容不同。毛泽东思想的主体内容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它主要解决政权和革命道路问题,主要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什么性质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革命的步骤和前途是什么的基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主要解决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问题,主要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二、毛泽东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而非开创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从1956年到1966年,我们党在这十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但是这一时期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只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而不是开创。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问题来阐述。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1956年秋冬,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波匈事件的爆发在我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国内社会改造的急促情绪以及经济建设中的冒进使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出现某些紧张。面对新出现的社会矛盾,许多党员和干部缺乏思想准备,甚至将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阶级矛盾来处理。鉴于此,1957年2月,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他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他还指出:“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

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前者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并提出要构建国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但是这种生动的局面并没有维持下去。由于毛泽东过分严重地估计了当时国际国内阶级形势,把本来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看成是新旧制度之间的矛盾,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主要矛盾,并且用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办法来解决。这不仅阻碍了生产力发展,而且干扰了经济建设。对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一方面我们应肯定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和发展,它所反映的毛泽东时代共产党人力图尽快完成由革命者向执政者角色转变的努力。它也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指导。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放弃了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思维与思想。他的阶级斗争理论依然存在于思想深处,这就造成他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提出后不久,便很快回到以阶级斗争观点审视社会关系、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旧思维轨道上来。正如胡乔木所说“说实在的,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矛盾,尤其是人民内部矛盾,这还是毛主席的贡献。这是一个已经认识了的事物。可是,已经认识了的事物,不一定就能永远正确的认识它^[1]。”

第二,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思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创造性地提出建设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思想。毛泽东曾多次指出: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经济落后、农民占人口的80%以上的东方农业大国,组织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立足于此^[2]。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高度重视农民和农业问题,并强调要处理好工农业之间的关系,提出必须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主张。在此基础上,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但是,毛泽东这个思想是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没有完全摆脱苏联“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也没有制定出

具体政策和相应的措施付诸实践。但对于传统的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甚至牺牲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模式而言,它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思想的探索,不仅有力地指导着当时的工业化建设,而且为新时期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随着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毛泽东对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有了进一步的深刻认识,对在这种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开始有了比较实际的思考。毛泽东指出: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只能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并首次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的思想。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首次对“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作了进一步的划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3]。”“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4]。”在1959年年底至1960年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5]。”“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在1981年的历史决议中改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作了明确的界定。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无论就其提出的历史背景、着力角度、具体含义和思想深度而言,都不能把它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简单地画等号。但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来源之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则是这一思想的重大发展。然而,这种清醒的认识并没有维持多久,急于过渡,急于实现社会主义,急于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的急躁情绪很快又在党内占了上风。无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制定和推动了超越现阶段的路线与政策,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原理,强调“一大二公”搞人民公社运动;无视客观经济规律,盲目鼓吹赶超英美的

“大跃进”运动。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提出了“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等正确的思想和主张,但都不了了之。这都是由于我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认识还不深刻,拘泥于马克思主义本本,没有摆脱传统观点和苏联模式的束缚,而且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存在局限性。“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形成的那些积极的思想成果,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时产生的,它当时还很不完善,也没有形成深刻、系统、全面的认识,尚未实现本质上的突破,并且不少思想后来也未能得到贯彻,从而也就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没有升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因此,毛泽东所开始的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而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并不是对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否定

十七大指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是对毛泽东思想和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的高度评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现实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开辟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并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逐步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下转第14页)

加快“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的规划与建设， 实现西安率先发展和科学发展

王 建 伟

(长安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54)

摘 要: 加快“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的规划与建设,对西安实现率先发展,加快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为此应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尽快制定或完善航空航天、装备制造等优化产业发展规划,进一步解放思想,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扩大开放力度,建立开发区、基地之间的协调联系机制,发挥规模效益和聚集与扩散效应,深化体制创新,加大政府科技投入,制定引导和扶持政策,构建自主创新和产学研一体化的新机制。

关键词: 西安; 率先发展; 科学发展; 制造业基地建设

2009年6月25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会,正式发布《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该《规划》赋予经济区“一高地、四基地”的战略定位,即全国内陆型经济开发开放战略高地,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全国先进制造业重要基地、全国现代农业高技术产业基地和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规划》为此提出了五个“率先”、四个“着力”的指导思想。从这五个“率先”和四个“着力”看,最根本的是这一经济区要实现社会经济在西部地区的率先发展。《规划》还提出六个“新”的发展目标。其中,综合经济实力实现新跨越和创新能力有新提升是此次规划的重中之重。因此,加快“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的规划与建设,对西安实现率先发展,加快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是西安实现率先发展的基础

加快工业发展,做大做强工业经济一直是西安

实现率先发展的主要途径。但受地域、体制、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西安工业经济发展一直落后于其他省会城市和单列城市,致使西安各项事业发展受到限制。此次规划提出在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建立“全国先进制造业重要基地”为西安工业经济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我们一定要通过加快航空航天、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基地建设,把不断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西安今后一个时期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做大做强工业经济,发挥西安在经济区产业发展的龙头作用。只有产业和产品具有核心竞争力,西安率先发展才会变为现实,进而带动整个经济区乃至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

二、建设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是西安加快科学发展的保障

此次《规划》最大的一项政策是支持西安统筹科技资源改革。中央财政对这个地区竞争前沿技术和共性技术的研发,以及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等都会加大引导性的投入(2012年和2020年R&D经费占GDP比重分别达到4.5%和6%)。把

全国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的示范基地放在西安,一方面说明西安拥有丰厚的科技资源,仅就西安高校科技力量而言,无论是航空航天、装备制造业、还是资源加工、高新技术产业,西安各高校都有国家级重点学科或省部级重点学科与之相对应,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成果转化都具有丰富的科技资源。另一方面,说明如何将科技资源转化为产业创新资源是当前我国产学研互动,建立创新性国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统筹科技资源改革对全国具有示范意义。因此,无论从提升创新能力,还是加快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产品化,实现西安社会经济的科学发展具有全局性的作用。

三、对策和建议

针对西安目前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目标,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一) 尽快制定或完善航空航天、装备制造等优化产业发展规划

《规划》提出在未来十多年时间要以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为重点,打造航空航天、机械制造等若干规模和水平居世界前列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知名品牌。为实现上述战略规划目标,西安应尽快制定上述产业的布局规划和建设规划。其中,布局规划应以经济区为辐射范围,以关中一天水工业走廊为轴,以渭北产业聚集区为面,以西安高新区、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阎良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西安航天产业基地为平台,制定产业布局规划。建设规划应以航空航天、装备制造、资源加工、物流服务等产业为核心,以延长产业链条,加强配套分工,推动产业升级为途径,以打造核心产业和产业集群为目标制定建设规划。构建以市场为基础,政府引导的宏观推进机制,以保证 2012 年和 2020 年西安地区生产总值目标的实现。

(二) 进一步解放思想,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扩大开放力度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缓慢是制约西安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只有大力发展壮大非公有制经济,才能不断增强经济活力和动力,形成合理竞争的市场环境,进而实现西安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因此,应进一步解放思想,进行体制和机制创新,制定引导和扶持政策,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

同时,应进一步扩大开放力度,加快航空航天、

装备制造业市场的国际化。要按照建立国际化大都市的思路,在打造现代西安、科技西安、生态和人文西安的同时,更要关注开放西安的建设,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狠抓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创新,提升国际化程度和对外开放水平,使西安成为海内外投资兴业的热土和全国内陆型经济开发开放的战略高地。

(三) 建立开发区、基地之间的协调联系机制,发挥规模效益和聚集与扩散效应

目前,西安已经形成了“四区两基地”等产业集聚平台,而整个关中一天水经济区有 21 个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5 个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基地和 3 个大学科技园区。虽然各个产业平台和科技创新平台都得到快速发展,但横向联系缺少沟通机制,整体效益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有必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建立分工协作机制,发挥西安各开发区和基地的规模效益。同时,也要主动与成渝经济区加强区际联系和沟通,从西三角分工与协作角度,不断壮大西安优势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效应。

(四) 深化体制创新,加大政府科技投入,制定引导和扶持政策,构建自主创新和产学研一体化的新机制

《规划》以加快产学研一体化,推进军民科技互动发展,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探索新路径为目的,以构建创新型区域为目标,对支持西安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建设进行了筹划。并从体系创新、技术创新、环境创新以及人才开发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途径与措施。这其中“统筹”是关键所在。要实现“统筹”,一要有动力,二要有手段和平台,三要有政策。从目前情况看,政府有统筹科技资源的动力,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科技资源供给主体以及企业等科技资源需求主体却缺乏统筹的动力,需要政府通过体制创新、加大政府科技投入,制定引导和扶持政策等体制机制建设来实现。因此,提出以下建议:

1. 深化科技成果产业化、产品化科技管理体制

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配置相结合的原则,建立负责科技成果产业化、产品化的专业管理部门或机构,并在高校、科研院所、开发区、产业基地等供给平台建立相应机构,形成科研研究和成果转化并重的管理体系,并与企业或企业协会建立互动机制。进而推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大